

大躍進以來我們的編目工作

北京外國語學院圖書館編目組

我們學院的特点是語文種類多，經常收到的圖書就有九種文字，這就對工作人員造成了一定的困難。

由於語文條件的限制，過去我們的工作是採取按文字分工的包攤辦法，而不是按工序來分工的。這種辦法，工作效率低，圖書時有積壓，不能滿足教學上日益增長的需要。在工作質量上，兩書同號和一書兩號的情況也時有所見。造成返工，費時很多。其它漏洞，如書標和書卡的“張冠李戴”等情形，給工作帶來的麻煩都是很大的。

這些情形，我們雖然也很“惱火”，但在大躍進前，我們卻沒有想出辦法來根本上改變這個局面。

通過整風，同志們思想覺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對圖書館事業作為終身事業的問題解決了，我們的工作在教學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明确了。因此，同志們的干劲都很大。這時候，黨提出了“敢想、敢說、敢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號召，全國各地都在轟轟烈烈的大躍進。我院的黨組織領導我們討論了圖書館工作能不能來個大躍進：“十一”快到了（指1958年），我們拿什麼來獻禮？

最初，在我們思想上還是沒有很好的、徹底的解放。當時我們認為苦干、實干就行，巧干就想得很少。至於圖書館工作能不能，特別是對編目組工作能不能來個技術革新，創造幾件工具，缺乏信心。有人認為，圖書館工作就是手工業式的工作，不好機械化。工作當然是可以提高的，但要像工廠一樣的因改進工具而成倍地提高工作效率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後來，黨支持了創造工具的同志，終於使他試制成功了刷漿糊機和目錄卡片油印機，使得貼書袋和限期表的效率，由 $1\frac{1}{2}$ 分鐘1冊，提高到1分鐘 $1\frac{1}{2}$ 冊，最近達到1分鐘2冊，提高工作效率300%（包括輔助工作時間在內）。

油印卡片的效率雖然提高很多了，但與全國先進圖書館來比較，仍是較低的。去年夏天，我們學習了清華的“四合一”工作法。除了財產簿沒有“合”

以外，其它如目錄卡、書卡和新書通報，我們都“合”了。原來，我們要对目錄卡、書卡、新書通報各打一次臘紙，現在只要打一次就够了；原來我們把印好的目錄卡還要按不同的目錄（分類、著者、書名等）分片，現在的大版油印等於把各種目錄的卡片事先分好了，提高工作效率一倍。

這樣，就把圖書館工作特別是編目工作原是手工業式的，不能實行機械化或半機械化、不能成倍地提高工作效率的神話完全粉碎了，技術革新的門打開了。

黨要求同志們戒驕戒躁、繼續前進。同志們想，加工工序是否也可來個大改變呢？也可來個半機械化呢？

過去，我們對書卡、書標和書上的書號都用打字機打或鉛筆寫的，不但效率低、費時多而且容易出錯。同志們根據“四合一”的精神設想，如果將書號打在臘紙上，經過一次校對，印在所有需要書號的地方，問題不就解決了嗎？

接着，我們又向書標一關進攻。

過去，我們不論書的厚薄，書標一律貼在書脊上。事實上，薄本書書標上的書號，在書架上根本看不清。經過了討論，我們採用蘇聯的將薄本書上的書號貼在書封底右上角地位，但時間上仍沒有省。師大圖書館的辦法，對我們有了很大的啟發。師大當時是在書封底右上角用橡皮章蓋上書標章，然後再印上書號。我們認為這辦法好是好，就是要另外蓋章，時間上沒有什麼省。我們討論的結果，是把書號直接印在書的封底上。這樣就省去了貼書標的時間。這當然也要有靈活性，如對深色封底的書，就得另行處理。

潛力似乎挖盡了。黨又及時指示，工序的改進，工作方法的改進，也是技術革新的內容之一。

同志們又在分編工作中打主意。這里面有沒有竅門可找呢？

有人想，分編就是一本書一本書的搞，還有什

么窍门呢？其实，只要用心找，窍门可以找出来，而毕竟也找出来了。

我們分編一本書，首先要检查：我們过去有过这种書嗎？是不是不同版本？如果是不同版本，将来它的目录卡还得重排一次。要省掉其中任何一道手續似乎是不可能的。

但同志們竟想出了一个办法，完全可以避免上述重重复复的手續。这个办法就是在給書号的时候，我們除了在書名頁上写上書号外，另外还写在一张临时片上。查重号时，如果不重号，就将临时片排入盒內；如果是重号，書上和临时片上都要复分，复分后，临时片仍排入盒內。临时片較普通目录片为高，能看見書号（最好用較薄的軟紙）。将来排正式片时，只要找有書号的临时片就行了，排片速度几乎快了一倍（排入正式片，抽出临时片，临时片的書号要划去，供再利用，不然就容易弄錯）。

中文圖書由于大部分是近期出版的新書，我們采用与外文稍有不同的办法。

采录組在送書来的时候，对采录組主动采購的复本書，已在書上夹顏色紙条标明了，所以用不着查重。我們对連續出版物、不同版本和早期出版物（肯定不是复本就可以不查）等才进行查重。在查出的連續出版物和不同版本的地位上我們放上一张空白的临时片（这张紙我們可以多次利用，直到紙用坏为止）。給書号后，我們也不是每种書都查重号的。我們仅仅是对于可能是重号的圖書，多产著者的圖書，以及常見的以地名、国名开始的团体著者的圖書才进行查重。其它的圖書我們就不查了。那么如果重了怎么知道？我們是在送書到書庫前，一定将公务目录片全部排完。而排書名片等于解决发现一書两号的問題，排分类片等于解决发现两書同号的問題。这项办法实行以来，根据統計，近千种書只有六种需要改錯，其中有两种是早期出版的最近重印書。改錯的时间，大大少于查重的时间。

去年“十一”国庆献礼，我們又配合教学需要編制了三部包括六种文字的專題目录。它們是“館藏馬列主义經典著作和共产党著名活动家著作目录”、“館藏党和政府重要文献目录”、“館藏語言学圖書目录”。在迎接1959年元旦时，又編制了“館藏西班牙文圖書目录”。今年与俄語学院合併时，又修改了“人大法”关于語言、文学、綜合参考三类的部分

类目，修訂了刘德人同志編的“汉语拼音著者号碼表”，都已脫稿，并已开始使用。

在前外語学院和俄語学院合併以后，組內同志有的下放劳动，有的支援其它单位 and 外調工作，因而任务增加（进書量与合併前相比却增加一半以上）。于是，要求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質量。快編、多編、不出錯誤，更成为同志們日益关心的問題。

在党政的领导下，我們加强了工作的計劃性。及时地制定了年度的和每月的工作計劃，定出了每个工作日的出書指标，建立了填写組的和个人的工作日志制度，这样就更便于工作的检查和推动。同志們的干劲很足，时间抓的紧，每分鐘都在紧张愉快地劳动着，爭取突破指标，超額完成任务。指标是已經被突破了，两院合併后的出書率与合併前相比，几乎增加了50%。这样一来，同志們的干劲更足了，提高工作效率的信心也更强了。党政领导又及时指示我們再从巧干上想办法。于是，最难解决的問題——改变包摊的工作方法为流水作业法，也终于被我們解决了。

前面已經提到过，由于我院圖書文字种类多，每个同志都要分担一、二种文字的分編工作，不便于采用按工序分工的流水作业法；但是，按文字分工各包一摊、所有的工序从头搞到底的办法是很緩慢的。于是針對了我組的具体情况，我們想出了单种文字的流水作业法。集中全組人力，在同一時間內，專搞一种文字的圖書。对这种文字專长的同志們就担負分編和排片的工作，其它的同志就搞加工和油印的工作。其它文字的圖書，也按这种办法輪流着搞。同时我們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在搞一种文字的圖書的同时，其它文字的急需編出的圖書，也一齐搞掉。这样的作法，既具备了流水作业法的优点，也解决了不能按工序固定分工的困难。我們的出書率又增加了20%。

这项新的工作方法，要求我們每人都成为多面手，要求我們每人都能了解并熟悉每个工序的工作。这项工作方法也大大增强了我們“全組一盘棋”的共产主义协作精神。而新的工作成績，又大大地鼓舞了我們的工作热情。我們要为創造更高更好的成績而百倍努力！